

制造“修昔底德陷阱”： 两种例外论与知识流散的政治学^{*}

李隽昉

内容提要：美国外交话语为何频频引用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乃至制造了“修昔底德陷阱”这样的错误论题？答案在于美国学术与政策的特定互动模式。文章考察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引用，结合古代与当代修辞学理论分析作者的论证策略发现，根植于美国古典学学科的“希腊例外论”和美国外交话语的主流“美国例外论”具有同样的价值基础，即基于其优势地位的优越信念；这一优越信念勾连了两种例外论，驱动着美国外交话语选择性地吸收古典学知识。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例解了这一知识流散的政治学，美国古典学针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反思佐证了这一跨学科的知识流散机制。

关键词：“修昔底德陷阱” 例外论 美国外交话语 古典学

作者简介：李隽昉，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 感谢《当代亚太》编辑部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一、引言：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

长期以来，记载公元前五世纪雅典与斯巴达之间伯罗奔尼撒大战的古希腊战争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名字屡屡出现在美国外交话语当中。2017年，美国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修昔底德陷阱”论题，暗示修昔底德所归纳的战争爆发原因——雅典实力不断增长，给斯巴达带去恐惧——适用于中美关系的现状。这一术语席卷了自此以后关于中美关系的各种评论。“9·11”事件发生以后，军事史家维克多·戴维·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向一位名叫“修昔底德”的将军提问，为何“穆斯林世界的那些人冲上街头誓言要我们死，而如今听闻我们的力量与仁慈，这些煽动者却突然退入了阴影之中？”后者用史书中的原话回答说，因为“希望与贪婪一前一后，前者构思企图，后者暗示成功之便，由此便招致最深重的毁灭。”^①一位雅典将军的叙事和评论似乎对应着今日美国的种种外交状况。修昔底德曾断言，他写就的是“垂诸永久的财富”（κτῆμα … ἐς αἰεὶ），^②表面来看确实如此，这一现象引发了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持续关注。

（一）“修昔底德陷阱”与外交话语中的古代知识

历史学者和国际关系学者已经发现，“修昔底德陷阱”是对历史文本的错误解读，不适用于中美关系。一方面，历史学者考察了“陷阱”论题与修昔底德文本及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关系，发现“陷阱”论题及类似外交话语

^① Davis Victor Hanson, *An Autumn of War: What America Learned from September 11 and the War on Terrorism*,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2, p. 145.

^② Th. 1. 22. 4. 本文采用《利德尔—斯科特希英字典》附表标准缩写古代作家与作品名字，参见 Henry George Liddell and Robert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 xxxvii (Thucydides), p. xix (Aristotle)。

是对史书文本的误读，是对古希腊历史的错误归纳，^① 无法为当代国际关系提供准确镜鉴。另一方面，国关学者发现，“陷阱”论题在中美关系中的适用性十分有限，是一种话语陷阱。^② 这已被充分论证并得到足够关注。

作为一项经验案例，“陷阱”论题还反映了一个更普遍的现象——美国外交话语中的古代知识。考察这些古代知识如何脱离了古典学的学科语境并进入当下的对外政策讨论中，能够刻画美国外交话语的知识生产机制并揭示美国学术与政策的互动模式。尽管关于“陷阱”论题的讨论汗牛充栋，但就笔者所见，将“陷阱”论题当作一类事态当中的典型案例加以讨论，以期更深入理解美国的研究则尚不多见。本文就从这一进路切入。

（二）外交话语的知识生产：学术与政策互动的机制探索

在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引用古代知识的动机和作用是什么？学者们已经剖开“陷阱”论题的论点并予以批驳，本文还将深入探索其作者之动机，以展示学科发展与国内政治、国内政治与外交话语之间的历时互动关系如何塑造了特定外交话语。本文的研究对象不是“修昔底德陷阱”，而是美国外交话语中的古代知识；本文的目标不是探索其来龙去脉、批判其观点之错误，而是揭示其知识生产过程之偏畸。同时，本文立足的不是修昔底德史书、目的不是发掘修昔底德作为理论资源的潜力，而是立足“修昔底德陷阱”这一经验现象，通过古代知识在外交话语中的流散（diffusion）去理解美国学术与政策的互动。

在美国，学术与政策如何互动？政府声称其政策制定是循证的、基于社

① 晏绍祥：《雅典的崛起与斯巴达的“恐惧”：论“修昔底德陷阱”》，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09～125页；何元国：《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论探微》，载《历史研究》2017年第6期，第126～139页；吴晓群：《公元前五世纪中叶的希腊城邦政治与“修昔底德陷阱”》，载《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5～13页；白春晓：《20世纪以来雅典与斯巴达两极对立的话语建构——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解读为中心》，载《历史研究》2024年第9期，第28～49页。

② 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与“复合世界”的来临》，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6期，第23～24页；徐弃郁：《“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关系》，载《当代世界》2016年第5期，第17页。

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的研究,^① 学者则不断探索着学术与政策如何相互影响。^② 既有研究存在两项局限, 一是这些研究往往只关注理论研究与政策生产之间的直接关系, 二是其所探索的学术与政策往往属于同一学科领域。事实上, 学术研究可能以更加迂回、间接的方式影响政策, 同时这种影响也未必发生在同一学科领域之内。以“陷阱”论题为例。学术研究塑造政策话语, 以间接的方式影响政策; 古典学知识跨越了学科藩篱, 影响了外交话语的生成。知识的跨学科流散可以作为观察美国学术与政策互动的一个更宽视角。

(三) 本文的论点、方法和内容安排

本文将回顾修昔底德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历程, 揭示特定价值取向下的其他学科知识生产如何影响外交话语的生成。本文的核心论点是: 两种例外论的勾连是古代知识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主要动力; 在对外政策讨论中引用修昔底德的作者会利用修辞学中的人格论证;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北美古典学内在的例外主义与“美国例外论”不谋而合, 这成为美国外交话语误用与滥用古代知识的基础。这一知识滥用机制还为美国古典学与身份政治的互动所佐证。

在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引用修昔底德的动机和作用是什么? 或者说, 修昔底德在对外政策讨论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回答这类问题的一般途径是离析修昔底德的每个引用者的看法及其语境, 然后梳理其发展脉络。美国对外政策议题繁芜, 引用者随意武断, 离析及梳理这一过程极其困难。故此, 本文将解释目标聚焦为作者的修辞策略, 这样就能通过一项简明可操作的研究议程来完成这一难题。我们将对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涉及修昔底德的表述进行修辞学研究, 重点研究这些表述的作者及其说服方式。

本文的分析方法属于侧重作者分析的修辞学。修辞是旨在说服的语言活动, 修辞学的分析对象是面向公众的文本, 包含作者、读者、说服方法三个

^① The Subcommittee on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of the Committee on Science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Blueprint for the Use of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to Advance Evidence - Based Policymaking*, May 2024.

^② Daniel Byman, “Writ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Academic Journals: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8, No. 4, 2024, pp. 137 - 166.

要素。这一分析框架最初的分析对象是古代公共演说,^①也适用于面向公众的书面文本。现代修辞学进一步明确了三者的关系:修辞文本是作者与读者之间就特定议题所进行的商议;修辞的目的是消除或重申双方在这一议题上的立场距离。^②我们将侧重作者角度,观察其修辞策略选择。第二节将就此建立一个基于修辞学理论的分析框架,考察古代知识是如何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

本文的内容安排如下。实证部分将考察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涉及修昔底德的表述。将美国对外政策讨论视为一种言语交流,考察塑造它的智识与政治力量,我们可称其为外交话语。外交话语包括但不限于官方表述以及政策制定者和政策研究者所发表的演说、采访,所撰写的书籍、论文、专栏、博客等。其中,热衷政策评论的知识分子所撰写的书籍、论文、时评等是本文主要观察对象,我们将其中提及修昔底德的内容称为“美国外交话语中涉及修昔底德的表述”。尽管体裁杂芜,但有一个共性无需质疑:这些表述提及修昔底德的目的是帮助作者就某些政策观点去说服读者。第三节将使用第二节的框架去考察上述材料并揭示:“美国例外论”是这些段落共有的信念;“陷阱”论题沿用了这一价值基础。“例外论”是美国外交话语与北美古典学科曾共享的价值基础,是修昔底德等古代作家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核心动力。

本文最后一节将展示,古代知识向美国政治的其他领域扩散时,依据的也是不同领域之间例外论的勾连。据此可以佐证本文分析框架:不同领域之间例外论的勾连的确是美国学术与政策互动的一种通用模式。

二、从古代知识到外交话语:两种例外论与一种价值

对政策观点作修辞学分析可知,美国外交话语中涉及修昔底德的表述常使用人格说服,其不基于说理而基于价值。细考知识在学科之间流散的政治学机理可见,美国外交话语之所以能够经常引述修昔底德,其基础在于“美

① Arist. *Rh.* 1. 3. 1 - 3, 1358 A 36 f.

② Michel Meyer, *What is Rhetori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232.

国例外论”与旧范式的古典学基于同一种例外论价值。本节将根据这两个层次搭建一个理解古代知识进入外交话语的机制框架。

（一）政策观点的修辞学：人格说服与修辞人格

在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引用修昔底德的动机和作用是什么？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指出，当代学者引用古代文本出于四种主要动机：对古代文本进行积极辩解或消极解构，重新解释古代文本，或将文本用作全新研究的灵感起点。勒博认为，引用修昔底德的国关学者常用的是前两种。^①在美国外交话语中也同样如此。上述分类从论点论据本身出发，而如果从知识生产过程出发，则还可进一步提问：这些辩解或解构是否成功？事实上，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引用并不总是能够形成有效论证，这些辩解或解构常常并不成功。

无法形成有效论证并不必然意味着这些表述都偏离了自己的论证目标，因为论证可以不基于说理，而基于其他要素。美国外交话语中关于修昔底德的表述都应当服务于文本作者的目的，即在相关对外政策议题中，说服读者接受自己的观点。就特定议题说服读者是一种修辞活动，因此，可以对这些文本展开修辞学研究：考察其作者、读者以及说服方法。亚里士多德认为，共有三种说服方法，包括演说者可以诉诸演说者的性格、诉诸将听众置于某种心情，或者诉诸有所证明。古代修辞家将这三种方法分别称为人格说服、情感说服、讲理说服（*persuasion by ethos, pathos, or logos*）。^②这一框架同样适用于书面文本，书面文本的作者等价于亚氏框架中的演说者。其中，讲理说服应该基于有效的修辞论证，^③但修昔底德的引用者往往没有提供有效

① Richard Ned Leb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ucydides”, in Katherine Harloe and Neville Morley eds., *Thucydides and the Modern World: Reception, Reinterpretation and Influence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96 – 197, p. 199.

② Arist. *Rh.* 1. 2. 3, 1356 A 1 – 4; Ed Dyck, “Topos and Enthymeme”, *Rhetorica*, Vol. 20, No. 2, 2002, p. 106.

③ 修辞论证（即演说中的论证）是一种特定的逻辑论证，在逻辑上应当是成立的。Aristoteles *Rhetorik: Zweiter Halbband*, trans. Christof Rapp, Berlin: Akademie Verlag, 2002, SS. 228 – 229.

论证。这提醒我们，分析不应局限于论证内容本身，观察视角还可以拓宽到整个修辞场景及其中的参与者。本文将展示，修昔底德出现在美国外交话语中时，作者经常使用的是人格说服、而非讲理说服。

与讲理说服不同，人格说服不是通过有效论证，而是通过由读者认知而形成的作者人格去形成说服力的：读者看到作者具有如此这般的人格，对作者本人建立起信任，从而倾向于接受作者接下来即将提供的任何观点。^① 当代读者或许以为文本中的说服主要是通过讲理来完成的，但古代修辞家已经指出，人格说服才是三种说服方式中最有力的，它建立了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可靠联系。^② 古代修辞学家把读者看到的作者人格视为作者真实人格的一部分；^③ 现代修辞学家则把作者人格定义为修辞人格（*rhetorical persona*），其被视为作者有意识针对读者塑造的自身形象。修辞人格是现代修辞学对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发展，创造修辞人格是人格说服的重要步骤。

在与读者建立修辞联系时，作者探索自身真实人格的各项既有价值，^④ 从中挑选出与读者有共鸣的部分价值，以此为基础去呈现特定的修辞人格。修辞学语境下的价值指社会生活中不被质疑或挑战的日常规范，^⑤ 创造修辞人格的关键步骤之一是对这些价值的遴选。既有研究强调作者—读者视角，指出挑选原则是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共有价值，而共有价值是作者真实人格与其在特定文本中的修辞人格之间的桥梁。^⑥ 本文则进一步聚焦作者这一端，探索使用特定表述的作者群体的内部共性，进而发现两个学科之间的共享价值是这一特定作者群体的挑选原则。

由理论而及实践，人格说服在美国政治修辞中起何作用？引用修昔底德

① Arist. *Rh.* 1. 2. 4, 1356 A 4.

② Ibid.

③ Arist. *Rh.* 2. 1. 5, 1378 A.

④ Michel Meyer, *What is Rhetoric?* p. 192.

⑤ Ibid.

⑥ 韦恩·C. 布斯提出“隐含作者”（*implied author*）概念，指出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角色身份与其现实身份不一致，修辞“人格”则包含了这一身份中的某些要素。参见 Wayne C. Booth, *The Rhetoric of Fiction*, Chicago, Illino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pp. 71, 73.

能够创造一种什么样的修辞人格？学者们已有所探究。戴维·扎列夫斯基（David Zarefsky）考察了人格说服在美国政治演说中的作用。^① 伊丽莎白·索耶（Elizabeth Sawyer）考察了英美国会演讲中的修昔底德引用并发现，由于美国国父曾经引用古代文本，故而引用修昔底德可以塑造作者的爱国形象。^② 索耶的观察立足于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而如果聚焦作者一方我们还可以发现，“例外论”所蕴含的、对自身优越性的信念是作为论据的修昔底德引用和作为论点的美国对外政策观点之间共享的价值。具体来说，旧范式的古典学所含有的“例外论”，与美国外交话语的主流“美国例外论”不谋而合，这就是美国对外政策讨论引用修昔底德的根本动机。因此，对政策话语作修辞学分析可以回答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

（二）知识流散的政治学：两种例外论与一种价值

修辞学理论提示我们，除了说理之外，作者还可以通过塑造修辞人格去说服读者。这引导我们去观察知识流散的另一种机制：通过共有的价值，而非通过知识本身的有效性和可迁移性。修昔底德之所以频频出现在美国对外政策的讨论中，是因为北美古典学与“美国例外论”都含有例外论。接下来，我们首先为“美国例外论”提出一个工作定义，然后展示基于例外论的古典学知识是如何被“美国例外论”吸收而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

1. 什么是“美国例外论”？

可以从结果和来源两个不同视角对其加以定义。一些学者发现，“美国例外论”可以表现为一种豁免论，即在特定事务上的双标做法或一种法律孤

^① David Zarefsky, “Philosophy and Rhetoric in Lincoln’s First Inaugural Address”, *Philosophy & Rhetoric*, Vol. 45, No. 2, 2012, pp. 165–188; David Zarefsky, “Making the Case for War: Colin Powell at the United Nations”, *Rhetoric and Public Affairs*, Vol. 10, No. 2, 2007, pp. 275–302.

^② Elizabeth Sawyer, “Thucydides in Modern Political Rhetoric”, in Christine Lee and Neville Morley eds., *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Wiley Blackwell, 2015, p. 530.

立主义。^① 豁免论者的共同立场是认为美国不受某种规则或规律的制约，包括实际的限制（如不受特定国际法限制）和规律的预言（如认为美国可摆脱历史法则^②）。另外一些学者判断其价值，将“美国例外论”分为两类：好的例外论由国际自由主义驱动，是“典范性的”，坏的例外论则是“十字军式的”“传教团式的”。^③

上述定义都基于结果，本文对“美国例外论”的工作定义则基于对其来源的辨析，即例外论可以来源于爱国主义、文化独特性，或者是对自身优越性的信念。^④ 有学者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国家身份认同的产物，^⑤ 有人认为，“美国例外论”是美国权力的产物。^⑥ 本文认为，“美国例外论”是两者的混合。如果仅仅以身份认同为基础，那么，“美国例外论”就是一种所谓“客观的”例外论、^⑦ 适用于所有国家或民族的文化独特论；基于权力地位的身份认同则会制造一种文化优越论。换言之，“美国例外论”在逻辑起点上可以是一种独特论或“客观的”例外论，但随着其霸权地位不断向这种独特论注入优越论、不断以主观性替代客观性，最终形成了“对自身优越性的主观信念”。

① 大卫·休斯将“美国例外论”的表现总结为三种：自国内国际法的豁免，在特定议题上的双标，以及法律孤立主义。参见 David Hughes, “Unmaking an Exception: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US Exceptionalism”,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 41, No. 3, 2015, p. 529.

② Trevor B. McCrisk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 US Foreign Policy since 1974*,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 10.

③ Trevor B. McCrisken,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the Legacy of Vietnam*, p. 8.

④ David Hughes, “Unmaking an Exception: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US Exceptionalism”, p. 531.

⑤ Hilde Eliassen Restad, “Old Paradigms in History Die Hard in Political Science: US Foreign Policy an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Vol. 1, No. 1, 2012, p. 70; 王立新:《帝国的叙事话语: 国家身份塑造与冷战时期美国外交政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版, 第 334 页。

⑥ David Hughes, “Unmaking an Exception: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US Exceptionalism”, p. 551.

⑦ Hilde Eliassen Restad, “Old Paradigms in History Die Hard in Political Science”, p. 69.

一个可能的反驳是，如果霸权地位是这种优越性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在成为全球性强国之前，“美国例外论”是否存在？不少学者相信，“美国例外论”的出现早于美国成为全球性强国，^①因为早在十九世纪美国已是地区性霸权。^②本文赞同这种看法。如果美国早已实际享有特定范围内的霸权地位，或者自己将自己的地位认知为某一范围内的霸权，那么，它就有可能基于这种认知、为自己的独特论不断注入关于自身优越性的主观信念，最终形成我们在此所定义的这种“美国例外论”。基于以上讨论，本文将“美国例外论”定义为一种基于霸权地位认知和例外信念的主观优越论。第三部分将展示这种主观优越论的三种具体形态。第一，“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这类观点表现在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伯纳德·诺克斯（Bernard Knox）、赫尔曼·沃克（Herman Wouk）的讨论中。第二，“美国优越性是内在的、有历史渊源的”。维克多·戴维·汉森试图证明这一点。第三，“霸权有其独特的缺陷、问题与挑战”。勒博与艾利森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

2. 古典学中的例外论

无独有偶，现代古典学自诞生以来带有强烈的例外论色彩。早期学者倾慕古希腊，将古希腊视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独特的存在和文明发展进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峰。晚近以来，古典学家们反思了这一底层信念。

20世纪八十年代末，马丁·贝尔纳（Martin Bernal）首次对希腊例外论提出了全面批评。他将重新发轫于近代欧洲、特别是德意志地区的古典学对古代世界的叙事总结为“雅利安模式”（Aryan Model），认为这与被其称为

^① 叶礼庭（Michael Ignatieff）认为，“美国例外论”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Michael Ignatief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in Michael Ignatieff ed.,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 11 – 12. 另有学者以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为界把美国外交分为两个时期，将例外论归为后一时期的产物。参见 David Hughes, “Unmaking an Exception: A Critical Genealogy of US Exceptionalism”, p. 541.

^② 人们之所以忽视这一点，是因为美国的西进扩张被列入其边疆史而非其外交史。Hilde Eliassen Restad, “Old Paradigms in History Die Hard in Political Science”, p. 67.

“古代模式”（Ancient Model）的古代人实际的自我认知模式并不一致，^①前者试图贬低非欧文明来美化希腊成就并将源于希腊的欧洲文明视为独特的、更优越的文明。^②到了21世纪，佩吉·杜布瓦（Paige Du Bois）揭示了十九世纪的德意志大学对古典学的主导，^③她提倡用后殖民主义等理论对古代文本作更细致的解读。她将古希腊研究及广义的古典学研究视为全球史的一部分，试图挑战古希腊在所有古代文明中具有优越性这一基础信念。^④最近学者们意识到，这种优越信念与学科发展历程中的种族主义密不可分，这一思想遗产在二十世纪仍广泛存在。^⑤

目前，许多学者都从种族主义角度出发来反思希腊例外论，然而大家尚未充分意识到，“希腊独特而优越”这一“例外论”本身就是这门学问中最为昭彰的秘密。只有指出、解析、弃置这一秘密，才能修复这一学科的认知秩序。同样，只有揭示学科知识的价值基础，才能清楚地观察到这个领域内的研究是如何流散到其他领域的。第四部分将考察美国古典学学科的这一自我反思与革命。在此之前，我们先来观察基于例外论价值基础的古典学知识与“美国例外论”之间原本是如何互动的。

3. 知识流散的政治学：共有价值与流散模式

共享价值构成了知识在学科之间流散的动力。首先，古典学的认知秩序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古代作品的不同阐释模式彼此竞争，选择一种叙事模式就是令其他叙事模式噤声；而一种模式中所含有的偏好及价值因此占据上风，是对另外一种叙事模式所含有的偏好和价值的胜利。正如贝尔纳所总结的，“雅利安模式”对“古代模式”占了上风，泛滥于十九世纪德意志学术

①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 New Brunswick,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7, p. 1.

② Martin Bernal, *Black Athena*, p. 378.

③ Page DuBois, *Out of Athens: The New Ancient Greek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 2.

④ Simon Goldhill, “Review: *Out of Athens: The New Ancient Greeks* by DuBois”, *Classical Philology*, Vol. 106, No. 1, 2011, pp. 77–78.

⑤ Denise Eileen McCoskey, *Race: Antiquity and Its Leg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4, 192.

界的优越论价值也因此内化在现代古典学学科之中。

当其他领域利用古代作品和古典学知识时，会有两种方式继承和发展这一价值基础（见表 1）。一方面，选择一位古代作者/某些文本（模式 A [2]）、选择关于该作者/该文本的某种阐释模式（模式 A [3]），就会受制于这一选择内在的价值和偏好。在讲理说服中，知识就是这样流散的。将视线拓展到人格说服则会发现，阅读古希腊经典这一行为本身也能为作者塑造特定的修辞人格（模式 B）。这种修辞人格的塑造并不依赖于特定古代作家的具体阐释模式，而是依赖古典学学科在那一时刻的主流价值取向。我们将前一类依赖讲理说服的论证模式统称为模式 A，将后一类依赖人格说服的论证模式称为模式 B，两者的运行都围绕着两种“例外论”的勾连而展开。一些作者表面上看起来选择了模式 A，但是其论证并不成功，其整个修辞活动仍然是通过模式 B，即人格说服来发挥作用的。

表 1 勾连两种“例外论”的论证模式/知识流散的机制

挑选论据： 依据与模式	选择古代作品？	选择哪位作家/ 哪部作品/哪段文本？	选择关于这段文本的 哪种解释进路？	分类
模式 A	模式 A (1)	模式 A (2)	模式 A (3)	讲理说服
模式 B	模式 B	—	—	人格说服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详细讨论修昔底德案例之前，需要应对两个潜在反驳。一是在美国对外政策讨论中，有什么是不属于“美国例外论”的？回答是：“美国例外论”就是美国对外政策讨论的最主要特点，美国外交话语的其他支流无以与之匹敌。^①二是古典学研究中有什么是不带有例外论色彩的？回答是：过去的古典学学科基于例外论而建，近来的学科反思指出了古典学摆脱其例外论基础的方向。第四节将简要展示这些反思。

在本文开篇我们已经看到，修昔底德在美国外交话语中令人瞩目。接下

^① 雷斯塔德指出，“美国例外论”（而非“典范—传教”二元）是美利坚认同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因而单边干涉主义（而非“孤立主义—国际主义”二分）是其对外政策的唯一主流。参见 Hilde Eliassen Restad, “Old Paradigms in History Die Hard in Political Science”, p. 57。

来我们将展示，这些援引修昔底德的外交话语是如何利用古典学的上述风貌的。我们将逐一展示作为论据的修昔底德是否论证了作者的主要论点，以及这些论点是如何通过勾连两种例外论来得到论证的。由此，这一节提出的分析框架将在修昔底德案例中得到展示性说明（illustration）。

三、外交话语中的古代知识：修昔底德案例

本部分将以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为阐释性案例，验证第二节所提出的知识流散机制。本文将考察范围限定在对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的学者与文学家：北美古典学奠基人贝佐·戈尔德斯利夫（Basil L. Gildersleeve）；在葛底斯堡引用修昔底德的美国前国务卿、古典学家爱德华·埃弗雷（Edward Everett）；将修昔底德带入海军战争学院的战争文学家赫尔曼·沃克和古典学家伯纳德·诺克斯；以结构视角解读修昔底德的政治学家彼得·弗里斯（Peter J. Fließ），结构现实主义国际理论家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与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结构主义讨论中聚焦霸权国的政治学家理查德·内德·勒博、古典学家维克多·戴维·汉森以及政治学家格雷厄姆·艾利森。这些人的论证策略勾勒出作为学科知识的修昔底德进入美国外交话语的智识路线图。

在修昔底德最终成为“陷阱”论题的主角之前，美国的知识分子群体走出了如下路径。戈尔德斯利夫和埃弗雷的演说都利用修昔底德及其作品来塑造自己论证时的修辞人格，因此，古典学知识一开始进入政策讨论时，便带有例外论色彩。经历过二战的知识分子利用海军战争学院教改契机，继续论证他们在二战中形成的信念：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冷战进入中晚期以后，国际关系学科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发展了对修昔底德的结构主义解读，这与结构现实主义为体系霸权国张目的意识形态倾向融为一体，“陷阱”论题就位于这条线索的末端。这些作者在连接“美国例外论”论点与修昔底德论据时，不是在讲理说服中践行模式 A，就是在人格说服中遵循模式 B。

（一）北美古典学学科奠基时期的例外论价值及修昔底德的出现

本文考察古典学知识如何进入美国政策讨论，从贝佐·戈尔德斯利夫这

一北美古典学“建城者”（*oikist*）^①对南北战争的评论开始。^②戈尔德斯利夫使用修昔底德来论证战争的“南方理由”，以埃弗雷为代表的北方胜利者则借助史家笔下的伯利克里重新定义了这场战争。

戈尔德斯利夫在战时撰写的社论《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南方人》^③和《“老南方”的信念》^④都大幅倚借修昔底德，提出了与北方观点截然不同的“南方理由”。他强调州权高于联邦权利，论证蓄奴诸州的退出权利是南北战争的起因，正如雅典领袖伯利克里痛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支配是伯战的起因。^⑤他认为蓄奴是一个经济问题，^⑥并非战争起因。南方坚持这是一场“国际战争”，北方则将此视为“内战”，^⑦认为蓄奴是政治问题、是战争的起因。

修昔底德在记载伯战时并不重视经济因素。那么修昔底德对于戈尔德斯利夫的上述观点有何用处？答案是借助熟读修昔底德这一事实，戈尔德斯利

① 贝佐·戈尔德斯利夫于1856年到1876年担任弗吉尼亚大学的古典学教授，1876年成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古典学系的创系教授并创办美国古典语文学旗舰刊物《美国语文学学刊》。“建城者”指古典时代希腊城邦在海外建立新殖民地时的领袖。参见C. Roberts Phillips, III, “Review: Classical Scholarship against Its History”,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10, No. 4, 1989, p. 639.

② 本文考察的是古典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对政策话语的影响，故将考察的时间段起点放在北美古典学建制化发展的开端、而非北美殖民地的建立、北美大学的建立，或北美第一个古典系的建立。北美古典学学科的建立通常被认为与戈尔德斯利夫的工作紧密相关。

③ Basil L. Gildersleeve, “A Southerner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The Creed of the Old South: 1865 - 1915*,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15, pp. 55 - 103. 以下简称《南方人》。

④ Basil L. Gildersleeve, “The Creed of the Old South”, in *The Creed of the Old South: 1865 - 1915*, pp. 7 - 52. 以下简称《老南方》。

⑤ Basil L. Gildersleeve, “The Creed of the Old South”, p. 24; “A Southerner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70.

⑥ Basil L. Gildersleeve, “A Southerner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69.

⑦ Virgilio Ilari, “Thucydides’ Trap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 American Political Rhetoric and in Senior Military Education”, in Luca Iori and Ivan Matijašić eds., *Thucydides in the ‘Age of Extremes’ and Beyond*, Newcastle upon Tyne and Venice: Thilo RISING, 2022, p. 267.

夫为自己塑造了特定的修辞人格。他带着南北战争经验去重读希腊历史，自比为在沙场上不忘研习古书的欧洲学者。^① 借助这些类比，戈尔德斯利夫形成了自己论证时的修辞人格，依赖的是模式 B。

埃弗雷在葛底斯堡国葬典礼上发表的演说也借助了例外论的内在价值。在演说末尾，他将阵亡将士比作雅典的阵亡将士，引用修昔底德笔下伯利克里的名言“整个大地都将是这些杰出者的坟墓”。^② 这对于整体论证并无多大作用，但伯利克里的形象对于演说者来说却很有用。修昔底德的葬礼演说极力渲染了雅典例外论，葛底斯堡葬礼上的伯利克里之音使得修昔底德成了美国爱国主义记忆的一部分，为美国知识分子后续对修昔底德的不断引用奠定了基础。^③ 埃弗雷利用了模式 A (2)：选择修昔底德史书中含有例外论色彩的篇章并以之作为自己论点的论据。

(二) 二战老兵的冷战信条：美国特殊责任论

冷战时期，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学改革为契机，古典学家伯纳德·诺克斯和战争文学家赫尔曼·沃克将修昔底德再次带入美国外交话语。两位老兵在二战中以行动支持美国对外政策的罗斯福信条；到了冷战时期，他们则用话语支持着国务卿马歇尔在冷战初期的看法：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这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变体。在论证过程中，诺克斯使用了模式 A (1)，借助流觞于古典学的雅典特殊论来论证“美国例外论”；沃克利用模式 B 为自己打造了一个独特的修辞人格：“像修昔底德一样的战争文学家”。

1.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改革

1972 年，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校长实施教学改革，^④ 一项重要举措是新增

① Basil L. Gildersleeve, “A Southerner in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86.

② Th. 2. 43. 3; Edward Everett, *An Oration delivered on the Battlefield of Gettysburg*, New York: Baker & Godwin, 1863, p. 30.

③ Elizabeth Sawyer, “Thucydides in Modern Political Rhetoric”, p. 531.

④ Andreas Stradis, “Thucydides in the Staff College”, in Christine Lee and Neville Morley eds., *A Handbook to the Reception of Thucydides*, p. 438.

《战略与政策》课程。该课程每周选择一个历史战略课题，^①邀请顶级专家讲座并将讲稿发表在《海军战争学院评论》。四十年以后，长期教授这门课程的学者发现关于修昔底德的讨论仍然是其中最受欢迎的内容。^②诺克斯和沃克都经此渠道参与了这一军方修昔底德传统的塑造，他们都是二战老兵，在对外政策上都持干涉主义立场。

2. 伯纳德·诺克斯：二战老兵的雅典特殊论

诺克斯是课程改革后第一位来到海军学院演讲的古典学家。诺克斯发表了两场演说：《修昔底德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政治与权力》和《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修昔底德的智识背景》。前者介绍史家及其记载的那场战争，后者补充修昔底德的智识背景。诺克斯指出，修昔底德“特别适合海军战争学院去花一些时间阅读”，他想不到“还有其他人如此刻板而专一地关注着主权国家之间战争的机理与方法、起因与结果”。^③两篇文章都提及修昔底德史书及伯罗奔尼撒战争，通过类比^④来阐明冷战情势。但是，这些类比缺乏一致性，借助修昔底德是无法对冷战全貌进行有效论证的。那么诺克斯为何要使用修昔底德来阐述冷战？答案是，修昔底德的雅典特殊论与这一论点中实际含有的美国特殊论之间形成勾连。

诺克斯是一位二战老兵，自西班牙内战开始就亲身投入战场抵抗法西斯主义，^⑤而这一行动立场的智识基础是雅典特殊论。他认为，雅典因其智识革命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⑥他还认为，雅典凭借对波斯的“圣战”而有

① “A Perspective of the College’s Strategy Curriculum”,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25, No. 4, 1973, p. 19; Stansfield Turner, “Challenge! A New Approach to a Professional Education at the Naval War Colleg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25, No. 2, 1972, pp. 3–4.

② Williamson Murray, “Thucydides: Theorist of Wa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66, No. 4, 2013, p. 31.

③ Bernard M. W. Knox, “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Politics and Power”,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25, No. 3, 1973, p. 6.

④ Bernard M. W. Knox, “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p. 10.

⑤ Marianne McDonald, “A Hero for Our Time: Bernard Knox”, *Arion*, Vol. 18, No. 2, 2010, pp. 133–134, 135.

⑥ Bernard M. W. Knox, “Fifth Century Athens: The Intellectual Background of Thucydide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26, No. 3, 1973, p. 16.

资格维系其帝国。^① 诺克斯没有像埃弗雷一样明确选择葬礼演说作为雅典特殊论的论据，相反他直接利用了古典学学科的既有共识作为论据，援引雅典特殊论作为美国特殊责任论的论据，这属于模式 A（1）。

3. 赫尔曼·沃克：像修昔底德一样的战争文学家

同样持美国特殊责任论的还有战争文学家沃克。1980年，沃克在海军学院发表演说《悲伤与希望：当代战争片论》，将勇敢、高贵、明智的人类精神视为希望，将冲突主导的世界称为悲哀的陷阱。他悲叹美苏对抗与修昔底德笔下的雅典与斯巴达完全一致，“两千年后，我们仍然困在修昔底德的世界中……我们应当如何挣脱这个修昔底德式的陷阱（Thucydidean Trap）？”^② “修昔底德式的陷阱”一语被用来描述修昔底德时代的世界特征。^③ 要将世界描述为晦暗的、充满暴力的，援引修昔底德看似有理。但二战之后的世界是否真的这样晦暗？事实显然并非如此。

沃克自认为是一位像修昔底德一样的战争文学家。沃克的《战争风云》和《战争与回忆》被誉为“以修昔底德和托尔斯泰为灵感的二战史诗”。^④ 在这两部书中他多次提及修昔底德，这是他洞察战争与写作苦难时的榜样。表面看来，沃克使用的是模式 A（2）（选择关于修昔底德的一种阐释，增加自己论点的可信度），但他的整个智识活动都围绕一个修昔底德式的作者身份展开，因此，他最有力的论据不是修昔底德的史书，而是与修昔底德一样的人格。沃克的论证事实上属于模式 B，暴力晦暗的世界是他为这修辞人格所铺垫的背景画布。

4. 美国特殊责任论的冷战背景

诺克斯和沃克都以自己的方式不断论证着罗斯福对外政策的态度，即：是否要参与二战？当然要，因为美国对世界负有特殊责任。这与马歇尔在冷

① Bernard M. W. Knox, “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14 – 15.

② Herman Wouk, “Sadness and Hope: Some Thoughts on Modern Warfar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33, No. 5, 1980, p. 6.

③ Herman Wouk, “Sadness and Hope”, p. 6.

④ “In Memoriam: Herman Wouk (1915 – 2019)”, The Pulitzer Prizes Official Website, May 17, 2019, <https://www.pulitzer.org/news/memoriam-herman-wouk-1915-2019>.

战初期一篇提到修昔底德的演说在主旨上是一致的。

1947年2月22日，马歇尔在普林斯顿校友午餐会演说时提道：“我认为，若未曾认真思考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及雅典覆灭的历史，任何人都不可能对当今若干基本国际问题形成深刻见解与坚定信念。”^①他相信行动基于信念，信念基于理解，而修昔底德构成了理解的基础，他呼吁年轻学生行动起来，直面“长期威胁”。他认为修昔底德是理解世界的指南，该观点与沃克完全一致。

这篇演说发表时，冷战的铁幕正缓缓落下。1947年2月，英国通知美国，他们无力继续支持希腊和土耳其；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国会就援助希腊与土耳其的表态与预算请求被视为杜鲁门主义的开端及冷战在美国的起源。马歇尔在向普林斯顿校友及在校生发出上述呼吁之时，就是杜鲁门政府得知并已经决定要接手希腊事务之时，但此刻他们正在试图说服国会和美国民众接受并支持该政策。在这一关键时刻，出现在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刻画了世界的晦暗前景，鼓励了干涉主义政策的出台。

5. 小结

综上所述，以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改革为契机、为了论证美国对世界所负有的特殊责任，诺克斯利用了这一论点与雅典特殊论的共有价值基础，沃克则自比为修昔底德式的战争文学家、创造了近似修昔底德的修辞人格，来论证世界暴力晦暗、干涉很有必要。这样的论点和论证方式，与冷战之初的美国国务卿对世界、对美国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是一致的。

（三）结构主义的修昔底德解读与国际关系学的结构现实主义

二十世纪下半叶，美国国际关系学中的修昔底德知识是一种结构主义解读。首先，政治学家彼得·弗里斯从两极视角观察了修昔底德笔下的伯战，奠定了对修昔底德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基础。随后，这种解读与国关理论的结构现实主义发展形成合流。以体系结构为解释变量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在理论发展过程中不断援引修昔底德，使其成为结构现实主义各项理论命题的论据。到了21世纪，这种对结构的关注进一步演变为对体系结构中一

^① “World Order and Security — Youth’s Responsibilities”,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 1947,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16, Nos. 392–417, 1947, p. 391.

个特殊单元霸权国的关注，下文将就此展开论述。

1. 彼得·弗里斯：设定结构主义读法

出版于1966年的《修昔底德与两极政治》一书将当时的两极体系与伯战之前的古希腊进行对比。^① 弗里斯认为，两极体系是战前五十年和平时期出现的政治二元性的必然结果；体系极数的减少使得小邦的政策余地缩减，双方对盟友的控制都日益帝国化。^② 简单来说，伯战起源于两极体系，但这并不符合修昔底德的本意。

这一不符合修昔底德本意的论题是如何得到论证的？弗里斯所依赖的文献表明他在论证中使用了模式A（3）。如前所述，选择哪位古代作者、选择关于这位古代作者的何种阐释模式，就会受制于该作者及其主流阐释模式所含有的价值和偏好。弗里斯所依赖的文献是十九世纪中期至晚期的德语论著，^③ 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雅利安模式”下古典学学科的知识产品。

这本书遭到了政治学家和古典学家的双重批评。政治学家们怀疑冷战与公元前五世纪雅典斯巴达战争是否能够形成有效类比。^④ 古典学家们则质疑弗里斯的研究方法。^⑤ 但在笔者看来，此书完成了一种集体想象和理解冲动，奠定了从结构视角解读修昔底德的基础。两极体系和伯战爆发之前的两大阵

① Peter J. Fliess, *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 Baton Rouge, Louisiana: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6, p. viii.

② Peter J. Fliess, "Alliance and Empire in a Bipolar World: Athenian Imperialism during the Peloponnesian War", *Archiv für Rechts- und Sozialphilosophie*, Vol. 47, 1961, p. 101.

③ Peter J. Fliess, *Thucydides and the Politics of Bipolarity*, p. xi.

④ Hans J. Morgenthau, "Review",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30, No. 1, 1968, p. 240; George Heiman, "Review",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Vol. 33, No. 2, 1967, p. 306; Bruce M. Russett, "Review",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1, No. 1, 1967, p. 167.

⑤ 学者们质疑其一手文献解读能力和二手文献使用方法，以及包括事实错误和以修昔底德为唯一历史事实这一不当做法在内的史实错误。参见 Malcolm F. McGregor, "Review", *Phoenix*, Vol. 21, No. 4, 1967, pp. 306-307; J. Joel Farber, "Review", *Classical World*, Vol. 60, No. 3, 1966, p. 120; Truesdell S. Brown, "Review",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371, 1967, p. 228。

营有一定相似之处，类似看法比比皆是。^① 这表明对这两个国际体系进行类比是学者们心底的普遍愿望，而该书是第一个系统性成果。学者们看到一个设想中的课题得以完成，故抱有兴致前来考察，却发现这一成果不尽人意。虽则如此，弗里斯此书却成功将修昔底德史述框定在两极体系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结构现实主义将继续发展对修氏史书的这种结构主义读法。

2. 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与解读的发展

结构现实主义两位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肯尼思·华尔兹和罗伯特·吉尔平都使用一种结构主义读法来理解修昔底德。^② 华尔兹认为修昔底德和他一样，相信体系结构比其他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③ 他的看法来自德国古典学家维尔纳·耶格尔，耶格尔曾指出，在伯战爆发时，意识形态冲突的实质是由城邦之间的实力对比决定的。^④ 吉尔平则认为，修昔底德对战争的归因属于一种“霸权战争理论”：战争由体系的特定结构特征引起，引发体系层面的深层变迁。^⑤ 他认为，修昔底德将体系变迁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事实上，吉尔平的归因来自他更早期的研究和更根本的学术信念：体系存在平衡点，体系稳定遭到破坏是霸权战争的根本起因。^⑥ 这样的理解预设了目标，逻辑上并不严密，修昔底德不能作为支撑这一推理的证据。

结构现实主义是“美国例外论”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理论变体。在冷战

① 1947年马歇尔演讲已有此类比。卡根把希腊同盟类比为联合国，把提洛同盟比作北约，把美国推行的“马歇尔计划”比作雅典的《大会法令》。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12-113.

② 参见李隽旻：《必要性现实主义：重构修昔底德的权力理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9期，第78~80页。

③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页。

④ Werner Jaeger, *Paideia: The Ideals of Greek Culture, Vol. I*, Trans. Gilbert Highet,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46, p. 397.

⑤ Robert Gilpin, “The Theory of Hegemonic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 597-598.

⑥ 关于国际体系不同结构的稳定性，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宋新宁、杜建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68~72页。

进入缓和之后两年，华尔兹指出两极体系稳定性最高，^① 吉尔平批评其观点并提出霸权稳定论。^② 有学者指出，新现实主义（即结构现实主义）将现有秩序当作自然秩序，是对美国所享有的霸权地位的一种合理化解释，这不是客观公正的科学观点，而是霸权国的主观意识形态。^③ 笔者赞同这一观察。本文对“美国例外论”的工作定义是“基于霸权地位的主观优越论”，结构现实主义的论证目标就是将这一权力地位合理化。修昔底德没有为结构决定论提供观点或史实证据。

那么，为何修昔底德会被用来论证霸权稳定论？勾连修昔底德与霸权稳定论的是美国国际学科在冷战后期的两项发展。一方面，修昔底德在国际关系学科日益获得一种“先驱”地位。另一方面，美国国际关系学为源远流长的“美国例外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外壳，即“霸权稳定论”。这样一来，将该学科“先驱”与该学科的现实政策观点连接起来就成了学科从业者的自然倾向。在这一过程中，选择哪位古代作者、选择哪段文本、哪种解读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业者们相信，本学科的先驱与他们分享同一种理论观点及其政策意涵。综上，修昔底德的结构主义读者们使用的是模式 B。

（四）霸权的偏执、优越信念与政策药方

二十世纪末以来，对修昔底德的结构主义解读继续发展并逐渐衍生为对结构中霸权国这一特殊单元的讨论。其中，勒博批评结构现实主义，但他的批评反过来固化了结构主义的修昔底德读法。汉森的古典学研究和政策评论都服务于一个目的：将霸权所享有的权力地位合理化。艾利森提出的“修昔

^①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 93, No. 3, 1964, pp. 881 - 909.

^② 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第 68 ~ 72 页。

^③ Richard K. Ashley, “The Poverty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1984, pp. 225 - 286, quote from 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ucydidean Realism: Between Athens and Melos”,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2, 2007, p. 171, n. 7; Alan Gilbert, “Must Global Politics Constrain Democracy? Realism, Regimes, and Democratic Internationalism”, *Political Theory*, Vol. 20, No. 1, 1992, pp. 8 - 37, quote from Laurie M. Johnson Bagby, “The Use and Abuse of Thucydide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8, 1994, pp. 149 - 150.

底德陷阱”论题反映了美国对霸权地位的忧虑。

修昔底德史撰的核心是雅典而非当时的霸权国斯巴达，那么，为何在围绕霸权的国关理论讨论中总是不时出现修昔底德的身影？关键在于两种例外论的勾连。如前所述，“美国例外论”是一种基于霸权地位的主观优越论，勒博、汉森与艾利森全都假定，体系中的这个主导国有其特殊问题，这种关切正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变体之一。在对这种行为体特殊性进行论证的过程中，修昔底德带着古典学学科的例外论色彩，为讨论者增添了人格上的可信度。这类学者大多使用模式 B。

1. 勒博：揭示霸权的偏执

勒博深入批评了美国国关学科对修昔底德所作的结构主义解读以及结构现实主义的政策观点，却延续了以修昔底德为先驱、以结构现实主义为终极政策关怀的学科基本构架，从而事与愿违地固化了该学科对修昔底德的结构主义读法。

在《政治的悲剧观：伦理、利益与秩序》一书中，勒博通过攻击现实主义包括修昔底德在内的常用论据资源，系统性地批评了结构现实主义。^① 第三、第四章对修昔底德的重新解读和他的论文《建构主义者修昔底德》^② 共同表达了如下观点：表面看来，修昔底德的叙事带有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要素，但事实上，他的史书是一种“层累的文本”；修昔底德强调语言的力量、规范的重要性、伦理的不可或缺性，这都表明修昔底德并非现实主义者，而是建构主义者。勒博对修昔底德的解读比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解更为细致准确。

勒博同时也批评了结构现实主义主导下的政策观点，^③ 但他关注的仍然是体系中的特定单元霸权国。第二次缓和结束后，美苏再度达到对抗高峰，勒博与政治学家威廉·布鲁姆、古典学家巴里·施特劳斯围绕史书中的弥罗

①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Ethics, Interests, and Ord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 65 - 167.

② Richard Ned Lebow, "Thucydides the Constructivist",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5, 2001, pp. 547 - 560.

③ Richard Ned Lebow, *The Tragic Vision of Politics*, pp. 1 - 64.

斯对话探讨了“强者的偏执”。勒博指出，八十年代美苏冲突的根源都是由“强者的偏执”所引起的，因为拥有权力的国家需要“看起来强大”，不能有任何“被认知的虚弱”。^① 布鲁姆并不认同这一观点，认为弥罗斯对话体现的是强者的傲慢。^② 施特劳斯则裁定，勒博的解读更有道理，但勒博的正确解读并不能形成普遍理论观点，霸权的恐惧不一定导致进攻性政策。^③ 在此，“霸权的偏执”应当被视为“霸权稳定论”在后缓和时期的一种变体，其焦点仍然是霸权国。

正是这一关注焦点，使得勒博尝试从结构主义解读中解放修昔底德的努力失败了。勒博对修昔底德的细致解读加固了修昔底德作为国关理论先驱的地位，但与此同时，美国对外政策讨论并没有偏离“美国例外论”。许多国关学者在论证其例外论政策观点时，比以前更加合法而自如地使用着修昔底德这一理论资源，但完全无视勒博的具体解读。打造“陷阱”论题的艾利森就是如此。勒博的论证意在批判而非加固例外论，因而既不属于模式 A 也不属于模式 B。

2. 维克多·戴维·汉森：溯源霸权的优越性

21 世纪初，“9·11”事件对美国社会造成巨大冲击，强化了美国对其例外状态与优越地位的强调，汉森就是其中一员。他展现了以“美国例外论”为基本信条的新保守主义立场，得到了诸多鼓吹“美国例外论”的新保守主义团体的嘉奖。在学术上，他试图论证西方在军事和文化上的优越性，特别是在《杀戮与文化：西方权势崛起中的重大战役》^④ 和《谁杀死了

① Richard Ned Lebow, “The Paranoia of the Powerful: Thucydides on World War III”,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1, 1984, pp. 10 – 17.

② William T. Bluhm, “Hybris and Aggression: A Critique of Lebow’s ‘Paranoia of the Powerful’ and an Alternative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3, 1984, p. 587.

③ Barry S. Strauss, “Thucydides on the Insecurity of Tyranny: A Comment on Professors Lebow and Bluhm”, *Political Science*, Vol. 17, No. 3, 1984, pp. 594 – 595.

④ Victor Davis Hanson, *Carnage and Culture: Landmark Battles in the Rise of Western Power*, New York: Anchor Books, 2002.

荷马？古典教育的死亡与希腊智慧的重生》^①中。这种新保守主义立场是“美国例外论”的重要变体。在政策评论中他直接化身为“修昔底德”，呼吁强硬抗敌；但这一鹰派立场与修昔底德的看法相去甚远。

汉森对西方在军事和文化上的持久优越性深信不疑。《杀戮与文化》一书通过分析历史上的数次重大决定性战役，挑战了军事史研究的一项共识：东西方的关键分水岭是西方发明火器。^②汉森认为西方军事从一开始就具有决定性优势。《谁杀死了荷马？》一书将美国文化优越性追溯至古希腊，呼吁美国年轻人多了解“自身文化的起源”。汉森将希腊视为独一无二的文明高峰，这延续了这一学科自十九世纪以来的希腊特殊论。进步派古典学家对这样的研究进路和学术观点进行了严肃批判，与本书作者起了争执。^③

论证美国优越性也是其政策评论的基调。汉森撰写的政评主要依赖人格论证，最突出的例证是“来自过去的声音——修昔底德将军谈战争”。这篇写于2001年11月23日的时评是新保守主义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最早发声之一。^④访问者采访“中将”修昔底德，“修昔底德”逐一回答其问题；每一个回答的末尾都附上了这一回答在修昔底德史书中的文本依据。

放在古典学框架内来看，此文是对修昔底德学的尖锐挑战。汉森对史书中的演说辞部分和叙事部分不作区分，将演说辞部分的陈述径直当作作者的观点加以引用。他笔下的修昔底德时而化身温和的帝国主义者伯利克里，时而化身激进帝国主义者克里昂，时而又化身修昔底德本人。^⑤本文没有前后一致、自圆其说的讲理论证。另一方面，此文最为清楚地展现了人格论证机

① Victor Davis Hanson and John Heath, *Who Killed Homer? The Demise of Classical Education and the Recovery of Greek Wisdom*, New York: Free Press, 1998.

② Hal Elliott Wert, “Review”,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Vol. 67, No. 2, 2003, p. 545.

③ Charles Beye, “Review”,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May 12, 1998, <https://bmc.brynmawr.edu/1998/1998.05.12/>; Joy Connolly, “Review”,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May 13, 1998, <https://bmc.brynmawr.edu/1998/1998.05.13/>; “Response: Hanson/Heath on Beye and Connolly on Hanson/Heath”, *Bryn Mawr Classical Review*, May 14, 1998, <https://bmc.brynmawr.edu/1998/1998.05.14/>.

④ Davis Victor Hanson, *An Autumn of War*, pp. 145 – 153.

⑤ Th. 3. 82. Davis Victor Hanson, *An Autumn of War*, pp. 147, 148, 151.

制：政策观点及其论证全部经由一个由作者裁剪过的“中将修昔底德”来作出；这一论点－论据框架之所以应当得到读者的信服，不是因为其论述融贯连续、逻辑合理，而是因为看起来它来自修昔底德本人。按照新保守主义例外论进行裁剪后得到的“中将修昔底德”就是作者本人的修辞人格。作者从这位古代史家身上借得了说服读者的力量，这一举动是模式 B 的标准体现。

3. 格雷厄姆·艾利森的“陷阱”论题：为守成国开具政策药方

21 世纪以来，“美国例外论”仍是其外交话语的主流，结构现实主义仍主导着美国国关学科。艾利森聚焦霸权国及其潜在头号对手，考察两者之间在结构变化下的互动模式。这种关注也是“美国例外论”的一种变体。

2015 年，艾利森在《大西洋月刊》撰文提出，“定义当今世界秩序的问题是与中国与美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① 他的研究以两个国家之间实力对比的迅速变化为自变量，以战争为因变量。他考察了 1500 年以来 16 个崛起国挑战守成国的案例，发现其中有 12 个导致了冲突。^② 他将这一发现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将当前世界秩序视为这一历史规律的潜在延续，建议美国外交决策人员“必须去思考一件看起来不可思议的事：可信地威慑潜在敌人，例如，中国。”^③ 2017 年，该研究以《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为题成书出版，引发广泛讨论。“陷阱”论题延续结构主义的思路，形塑和想象霸权国与其头号潜在敌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将中国与修昔底德联系起来具有决定性影响。^④ 然而，霸权国失去优势地位不是修昔底德

①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 Trap: Are the U. 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②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 Trap? Resources and Methodology”, The 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Harvard Kennedy School, May 2017, <https://www.belfercenter.org/programs/thucydides-trap/thucydides-trap-resources-and-methodology>.

③ Graham Allison, “History Lesson: The Thucydides Trap”, *Foreign Policy*, No. 224, 2017, p. 81.

④ 据有学者统计，“中国”与“修昔底德陷阱”同时出现的文献数目在 1989 年、2012 年、2013 年分别是 0、7、23，2019 年则超过了 500；转折出现在《注定一战》出版那年。参见 Richard Hanania, “Graham Allison and the Thucydides Trap Myth”, *Strategic Studies Quarterly*, Vol. 15, No. 4, 2021, pp. 13–14.

的忧虑，对头号潜在挑战者的锁定也不是修昔底德史书暗示的政策答案。“陷阱”论题的论点与论据都不是来自于修昔底德；其论点来自结构现实主义，论据则来自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

首先，“陷阱”论题的论点来自结构现实主义的 policy 关切。结构现实主义的 policy 关怀是霸权国，“陷阱”论题关心的也是体系中的这个特定单元。在解释结构变化所造成的体系“陷阱”具体如何对这个霸权国发生作用时，艾利森援引了雅典帝国主义三动因（利益、恐惧、荣誉）当中的“恐惧”。^①然而，雅典的恐惧与斯巴达的恐惧并不是一回事。艾利森误读了修昔底德和他在此所引用的卡根，^②继承的是美国国关学科的政策关切。

其次，“陷阱”论题的论据是对欧洲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总结。因应结构变化，守成国应当采取措施去阻止或延缓结构的变化，也就是发动预防性战争。这事实上是对十九世纪欧洲国际关系的总结。^③ 勒博把霸权国对“被认知的虚弱”的不当恐惧称为霸权的偏执，艾利森则试图为这种偏执进行辩护并开具政策药方。能够为此提供证据的不是修昔底德。那么，为何修昔底德被用作论据？这仍然与修昔底德在国关学科的先驱地位密切相关。艾利森将不符合修昔底德原意的因果关系命名为“修昔底德陷阱”，将脱胎于近代欧洲国关史的经验归纳作为其论据，其论证模式类似吉尔平和华尔兹，即遵循该学科从业者的普遍倾向，将学科先驱与学科的政策观点连接起来。他使用了模式 B。

综上，我们回顾了修昔底德的结构现实主义读法的演进。首先，弗里斯奠定了对修昔底德进行结构主义解读的基础。其次，以两极格局为经验观察起点的国关理论家们形成并完善了对修昔底德的结构主义解读。最后，勒博对结构现实主义的批评反而将研究焦点转向了特定结构中的一个单元——霸

① 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65~67 页。

② 卡根对战争原因的解释是：战争不是必然的；几个主要城邦（雅典、斯巴达、科林斯）都不愿意发动战争，但它们的行为使得它们都要为战争的爆发负上一定责任；是政治家的误判导致了战争的爆发。特别是，卡根拒斥了弗里斯对修昔底德所作的结构主义解读。参见 Donald Kagan, *The Outbreak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pp. 354-356。

③ A. J. P. 泰勒：《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沈苏儒译，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第 166 页。

权。随着结构现实主义日益成为“美国例外论”的主要理论外壳，关注焦点转向了这个特定单元面临的挑战及其最强大的潜在对手。“修昔底德陷阱”论题就位于这一接受史线索的末端。通过将修昔底德引为自己的同党，结构主义者论证了具有例外论色彩的政策观点。

（五）案例小结

将上述所有案例填入表 1，可以得到表 2。我们发现，非古典学专业的作者大多使用模式 B（即人格说服），使用讲理说服的三位作者则均处于知识流散的关键位置上：埃弗雷将修昔底德根植在美国国族认同的奠基性场景中，这一影响及至汉森；诺克斯使得军方对于修昔底德这一美国特殊责任的论据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吉尔平、华尔兹到艾利森的结构主义理解则都源于弗里斯的结构主义解读。换言之，每当知识发生新一轮流散，起关键作用的作者就势必借助讲理论证，但这种论证往往基于两种例外论的合谋；而每当知识进入学科内循环，修昔底德就变成了修辞人格的绝佳配料，其史书亦将服务于人格说服而非讲理说服。

表 2 “美国例外论”作为政策观点与修昔底德作为论据：论证模式

模式 A (讲理说服)	模式 A (1): 选择古代作品? 诺克斯 (雅典独特性)	模式 A (2): 选择哪位作家/哪部作品/哪段文本? 埃弗雷 (葬礼演说中的雅典特殊性)	模式 A (3): 选择关于这段文本的哪种解释进路? 弗里斯 (19 世纪古典学的雅利安模式)
模式 B (人格说服)	戈尔德斯利夫: “沙场古典学家”的“南方理由”		
	沃克: “像修昔底德一样的战争文学家”		
	吉尔平、华尔兹、艾利森: 利用修昔底德的学科“先驱”地位, 论证学科终极政策关怀 (霸权稳定论)		
	汉森: 以“修昔底德将军”自居, 合理化霸权的优越信念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四、古代知识的流散机制：来自优势群体与非优势群体的解读

第三节展示了美国对外政策讨论是如何引用修昔底德并与古典学例外论相互勾连，进而论证“美国例外论”的。这印证了第二节的分析框架并回答

了本文的主要研究问题“美国外交话语引用修昔底德的动机和作用是什么”：这些作者的动机是论证带有“美国例外论”色彩的政策观点；引用修昔底德的作用是为作者增添人格保证，从而增加论点说服力；这一说服方式基于两种例外论的勾连。本文所揭示的修辞策略有助于理解论点与论证的失配，有助于从更高的分析层次把握繁芜引文背后的不变机理。

两种例外论的勾连是美国学术与政策互动的一种常见模式，在美国政治其他领域对古代知识的挪用当中亦有体现。2020年以来，美国古典学学科中的种族主义和厌女倾向得到广泛反思，这两种反思都揭示了学科的例外论价值基础，揭示了美国国内政治的其他领域是如何依靠共有的例外论去选择性地使用古典学知识的。因此，本文所提出的知识流散机制不仅在修昔底德案例中得到了验证，还在美国政治的其他领域得到了验证。

（一）国内政治中的古代知识：种族与性别

近年来，身份政治在美国蓬勃发展，相关学科也开始就此展开自我反思。古典学的学科反思主要从种族与性别这两个视角切入。基于种族要素的反思多数聚焦古典学的知识来源和知识生产过程，基于性别立场的反思则开始关注学科知识流散的过程与结果。两种反思都表明，基于优势群体优越论的例外主义是古典学学术与美国国内政治互动机制的核心线索之一。

基于种族要素的反思聚焦美国古典学的知识来源和知识生产过程。《美国语文学学刊》2022年夏季刊集中反思了古典语文学的文化身份构建方式，揭示其文化排他性和认知论上的无知。^①《美国古典语文学会通讯》2024年春季刊通过揭示种族这一“昭彰的秘密”来重思这一指导性主题对学科知识生产的影响。^②学者们指出，希腊不应该是古典学的唯一经验池，^③还发现

① Emily Greenwood, “Introduction: Classical Philology, Otherhow”,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43, No. 2, 2022, *Special Issue: Diversifying Classical Philology*, p. 189.

② Patrice Rankine, “Introduction: Racializing Antiquity, Post-Diversity”, *TAPA*, Vol. 154, 2024, *Special Issue: Race and Racism: Beyond the Spectacular*, pp. 2-4.

③ J. Mira Seo, “Classics for All: Future Antiquity from a Glob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40, No. 4, 2019, p. 709.

只谈学术、避谈种族的学科原则事实上就是一个种族计划。^① 这导致该学科课程设置过度强调欧洲文明遗产，貌似价值无涉的语言训练方法实则饱含歧视，少数族裔学者发表和成长都受到限制，学科代表性因此严重不足。这一反思揭示了优势种族的优越论是如何主导古典学学科知识生产过程的。

针对性别问题的学科反思同样关注知识生产过程，古代世界的女性及其他边缘群体因此得到了更广泛的关注。^② 另一方面，基于性别立场的反思也关注学科知识外溢的影响。以唐娜·扎克伯格（Donna Zuckerberg）的研究为例。她考察了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厌女倾向是如何利用古典学知识的。^③ 优势群体又一次依据其优越信念，即一种例外论，挪用了古代知识。

2025 年就任的新一届美国政府对上述这类反思所代表的学科改革方向施加了极大压力，这一趋势未必能够持续发展。对于这类反思会否继续、会否对学科发展产生更大影响，我们无从得知；但是从上述两种反思中可以看到，古代知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流散，依靠的是不同领域之间共享的例外论价值基础。

（二）古典文明与非优势群体的阐释权

我们已经看到，此前美国古典学学科中至少存在两种优越论，一种基于优势种族，一种基于优势性别。然而，这种优越信念不仅可能来自优势种族、优势性别，也可能来自国际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美国外交话语中的修昔底德知识就利用了类似的优越信念，应当被视为这种普遍现象的案例之一。这些例外论一直以同样的方式内嵌、介入、利用着这一范式下的古典学学科所生产的知识，但未得到充分批评。

美国外交话语在援引修昔底德时，或者遵循模式 A，选择特定作者、特定文本，以及关于这些内容的特定阐释模式，利用其例外论价值取向；或者遵循模式 B，以阅读古代经典这一行为本身来打造一个貌似可信的修辞人

① Patrice Rankine, “Introduction: Racializing Antiquity, Post - Diversity”, pp. 8 - 11.

② Harriet I. Flower, Josiah Osgood, “Introduction: Women in Public Life in Republican Rom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 145, No. 1, 2024, *Special Issue: Women in Republican Rome: Space, Religion, and Influence*, p. 1.

③ Donna Zuckerberg, *Not All Dead White Men: Classics and Misogyny in the Digital A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25.

格。两种模式都依赖古典学学科本身的例外论倾向。如果不是古典学家时时聚焦修昔底德笔下作为例外典范的雅典，如果不是古典学学科在上述反思之前自有一种对其研究对象的优越和例外信念，那么，美国外交话语就没有动力去援引修昔底德，也没有动力去制造类似“修昔底德陷阱”的论题。

古典文明的接受史刻画着世界文明的发展和演进。古代知识的流散是否一定会跟随某种优势群体的优越论调——无论其是优势种族、优势性别、还是占据权力优势的霸权国家？未必如此。一方面，我们看到，依赖不同领域之间例外论而得以流散的古代知识很可能被迫成为不公正的国内政治或国际政治现象的注脚。但另一方面，古典文明是属于全世界、所有人的财富，来自非优势国家、非优势群体的解读完全可能并可以帮助古代知识以完全不同、更为公正的方式继续扩散和传承。要将修昔底德史书和雅典经验作为国际关系的理论思想资源，实在无需拘泥于“陷阱”这一错误论题或某个优势群体的解读。对古典文明更为公正多元的解读将不断为其增添新的内涵和光彩。修昔底德史书之所以“垂诸永久”（ἐς αἰεὶ），其原理正在于此。

五、结 语

清晰刻画上述现象及其机理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并回答与“修昔底德陷阱”“美国例外论”、修昔底德接受史等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陷阱”论题之谬误，仅仅在其观点错误吗？非也，它还是一种有缺陷的知识生产机制的产物。“美国例外论”之不合常理又冥顽不灵，依靠的仅仅是外交话语和国关学科的自我生产吗？非也，这种外交话语还得到了来自其他学科的知识支持。修昔底德被反复误读，仅仅是因为部分对外政策讨论者的历史学识浅陋可笑吗？不止，误读是两个推崇例外论的学科的合谋。综上所述，本文所回顾的经验事实既是对“美国例外论”的一项案例研究，也为修昔底德接受史提供了一个国际关系学和国别研究的视角。本文发现，共享的价值可以作为学科间知识流散的基础。通过观察“修昔底德陷阱”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我们重构了古代知识在学科间如何流散，再现了美国外交话语如何生成。

Abstracts

A Chinese Perspective on Resolving the Legitimacy Deficit in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Xu Xiaofang and Wu Zhicheng

Abstract: As profound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accelerate, the legitimacy defici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has become prominent. It is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limited state authorization, insufficient democratic participation, low decision-making efficiency and a lack of governance norms. In essence, it represent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institutional authority and actors' recognition. This deficit is influenced by the game between state author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autonomy, the asymmetry between these institutio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wer structure, the tension between insufficient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governance demand, institutional inertia and lag effects, the dilemma of institutional fragmentation, and the asynchrony between obsolete governance norm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airness and rationality. As a responsible major country, China upholds the concep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s of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promotes the reform and construction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and contributes Chinese wisdom and strength to practicing the common values of humanity, consolidating the foundation of state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and mitigating the legitimacy deficit of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Key Words: Global Governance Institutions; Legitimacy Deficit;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Extensive Consultation, Joint Contribution, and Shared Benefits

Fabricating the “Thucydides Trap”: Two Exceptionalisms an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Li Junyang

Abstract: Why does U. S. diplomatic discourse frequently cite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 Thucydides, even going so far as to fabricate erroneous theses like the “Thucydides Trap”? The answer lies in the specific interaction pattern between U. S. academia and policy circl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ucydides citations in U. S. diplomatic discourse and, combining ancient and contemporary rhetorical theories to analyze the authors' argumentation strategies, discovers that “Greek Exceptionalism”—rooted in the discipline of Classic—shares the same value foundation as the mainstream “American Exceptionalism” in U. S. diplomatic discourse: a belief in superiority based on dominant status. This belief in superiority links the two exceptionalisms, driving U. S. diplomatic discourse to selectively absorb classical knowledge. Thucydides in U. S. diplomatic discourse exemplifies this politics of knowledge, while reflections within Classic regarding racism and sexism corroborate this interdisciplinary mechanism of knowledge.

Key Words: “Thucydides Trap”; Exceptionalism; U. S. Diplomatic Discourse; Classics